

doi: 10.3969/j.issn. 1674-2346.2011.01.009

莫高窟北周供养人服饰研究

竺小恩

摘要:以莫高窟北周第290、296、428窟部分供养人服饰为研究对象,指出北周在中国服饰文化史上具有导开先路的作用。第一,中国男子服饰两大体制萌芽于北周;第二,中国女子服饰在北周时出现了与传统服饰截然不同的新样,窄袖小衫配及腋长裙这一服装样式对隋唐女子服饰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三,北周时期大量引进胡服元素,促使中国服饰走向多元化。

关键词:莫高窟;北周壁画;供养人服饰

中图分类号:TS94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46(2011)01-0032-08

一、莫高窟北周供养人服饰概述

根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资料统计,北周时期修建的15个洞窟,其中11窟有北周供养人画像。这11窟为:第290、294、296、297、298、299、301、428、430、438、442窟。

第290窟:中心柱东向面塔座下座身16身供养人,左右两侧都有一位供养比丘作引导,供养比丘着袈裟;后面跟随的供养人服装整齐划一,一律为褒衣博袖的中原汉式服装:上身为交领大袖袍服,下身为长裙。但色彩变化不一。见图1。



图1 第290窟中心柱东向面供养人

中心柱北向龕基座男供养人,着圆领窄袖束腰袍服,不开襟,衣略长于胡服褶衣,下着裤,裤口小。前2身拢袖,后1身扭头向后,似在招呼人,人物线描和衣服均用土红色,显得单纯质朴。见图2。

南壁下部右侧礼佛的男供养人上衣为圆领、窄袖、束腰,下着小口裤(这与中心柱北向龕基座几身供养人服饰相同);左侧的男供养人,前面有6身比丘作引导,比丘身后内侧有一小身穿胡服褶衣的男童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图1来源: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图2来源: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3·敦煌北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收稿日期:2010-10-27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2009年度科研计划项目《敦煌莫高窟壁画世俗人物服饰研究》[编号:Y200908560]

作者简介:竺小恩,女,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浙江宁波315211)

供养人，侧身扭头注视着后面的世俗供养人；后面世俗供养人第一身身材特别高大，服饰尤其宽博，身着交领大袖深衣袍服，袍外面披一件红色大袍，系胡汉服装合璧（“披大袍”为胡装，第 290 窟佛传故事中有一位西域相师就是身披大袍），头上似扎幅巾；其身后的供养人上身着对襟大袖宽博襦袄，下身着长裙，长裙曳地，头上似戴帻。见图 3。

第 296 窟：（主室）东壁门南侧女供养人，前 2 身为比丘尼形象；后面几身为世俗女性，其中第一身着襦裙，外披红色长袖大袍（胡汉结合）。第六身世俗女性供养人为一女童形象，头梳双环髻，窄袖小衫，间色长裙，裙腰很高至腋下，这种服饰是隋唐时期的流行服饰。其余几身世俗女性供养人均着交领大袖襦袄，襦袄较长，下着长裙，肩披



图 2 第 290 窟男供养人



图 3 第 290 窟南壁下层供养人



图 4 第 296 窟（主室）东壁门南女供养人

长帛。见图 4。

第 428 窟主室中心柱四向面龕坛沿及主室四壁画有 1000 多身供养人。每身供养人前面都有一条题榜，题记多已漫漶不清，尚能辨认的不足 30 条的题记中有“沙门比丘”“比丘”“童子”“释子”“弟子”“清信士”等题衔，有“晋昌郡”“凉州”“甘州”等地名，有“永隆寺”“福祥寺”等寺名，可见信众之广泛。此窟中心柱北向面座沿画供养人 36 身，见图 5。东壁门南侧佛像下 3 列供养人，上面 2 列为着袈裟的供养比丘，下面 1 列为着大袖裙衫的女供养人，见图 6。北壁佛像下面 3 列供养人画像，其中上 2 列为供养比丘形象，下 1 列为男供养人形象，见图 7。

图 5、图 6 中的女供养人服饰一律为中原传统大袖裙衫。衫大而宽松，衣襟在领处相交，两手拢于袖内，宽袖下垂直至膝部，衫长过膝，近于脚踝，长裙曳地。宽袖、大衫、长裙，层层叠叠，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觉。面部和发式已漫漶不清。图 5、图 7 中男供养人一律着红色圆领袍服，不开襟，袍长于

图 3、图 5 来源：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 1 卷，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图 4、图 6、图 7 来源：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3·敦煌北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版。



图5 第428窟中心柱北向龕坛沿 男女供养人



图6 第428窟东壁门南侧供养比丘和女供养人



图7 第428窟北壁佛像下面供养比丘和男供养人

胡服褶衣，袖口大于窄袖胡服，但远远小于中原汉人的广袖，首服难以辨识，似裹巾。

综合考察北周供养人服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男子服饰主要有两种：一是传统的鲜卑服饰裤褶服有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上身的褶衣由原来的开襟变为不开襟、衣身变长变宽，说明胡服褶衣在中原袍服影响下逐渐向圆领缺胯袍过渡。二是中原汉服样式，有着曲裾深衣宽袖袍服、冠帽、穿笏头履的供养人，更有着大袖襦裙、戴帻的供养人。

第二，女子服饰主要也有两种：一是大袖襦裙，头梳环髻或各种高髻。二是窄袖小衫配及腋长裙，这种服饰在隋唐时期十分流行。

第三，供养人服饰中还出现了帔帛、大袍等服饰新样。这些都与胡服的引进有着极大的关系。

二、从莫高窟北周供养人服饰可知，北周是中国服饰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 中国男子服饰两大体制初露端倪

从莫高窟北周男供养人服饰看，中国服饰的两大体制——公服与常服 在北周时期已经萌芽。北周壁画中的男子服饰主要有2类：一类是经北魏孝文帝时期改革后的宽博的中原汉式服装，或为曲裾深衣宽袖袍服，或为大袖宽身襦裙，主要用于朝会等正式场合；另一类是北齐、北周时期胡服裤褶在中原袍服影响下逐渐演变中的圆领袍服，它与裤褶服共同组成北周时期的常服。

汉魏衣冠在北周供养人服饰中大量存在。第290窟中心柱东向面跟随在比丘身后的供养人一律为褒衣博袖的中原汉式服装：上身为交领大袖袍服，下身为长裙。同窟南壁下部左侧世俗男供养人第一身着交领大袖深衣袍服，袍外面披一件红色大袍，头上似扎幅巾；其身后的几身男供养人上着对襟大袖宽博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增订本)(第二版),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襦袄,下着长裙,长裙曳地,头上似戴帻。

这种服饰在北周故事画中也随处可见:在故事画中,帝王大臣的礼服往往为曲裾深衣、宽袖袍服,冠帽,高头履等;王公贵族士人的常服则为大袖宽身衫襦、曳地长裙、巾帻纱帽。第290窟佛传故事净饭王戴进贤冠,着曲裾深衣宽袖长袍,系蔽膝,着笏头履;大臣们头戴纱帽,身着深衣长袍,脚着笏头履。第428窟须达拏太子施象本生中,国王戴进贤冠,着深衣袍;须达拏太子着宽袖长袍;大臣戴纱帽,着深衣袍。第296窟窟顶南披善事太子本生中,国王、太子均着宽衣博袍。

褒褊的服饰风尚来自于中原南朝。东晋末年与南朝时,士大夫生活优裕,衣服的款式趋尚于博大。北魏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期间,对鲜卑服饰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要求鲜卑人的冠服依汉制,模仿南朝。在以孝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倡导下,北魏服饰一改胡族左衽紧身的旧制,而穿上了与南朝一样宽衣博带的汉式服装,这种褒衣博带的服饰风尚经西魏至北周一一直在北土盛行着。

圆领缺胯袍是旧式鲜卑褶衣在西域服式和中原袍服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服装:圆领,不开襟,衣侧开衩,衩口最初较低,后渐高,直抵胯部,故以“缺胯”命名。这种服装在北周时还处于初级阶段中,至隋唐成熟,并成为男子流行的常服。北周时期服饰上胡汉并举,要求大朝会时正式采用汉魏衣冠,平时则可以着袍,即圆领袍服。圆领袍服在北周相当普及。这一服装样式在北齐北周时期产生,至隋唐时期成熟,成为最为典型的胡服,也是隋唐五代最具代表性、最为流行的男子常服,甚至为女子钟爱的服饰。

从莫高窟北周壁画中可以看出,其实,从鲜卑的褶衣发展到隋唐流行的圆领缺胯袍,这中间有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见于莫高窟壁画北周供养人的圆领缺胯袍还是属于初期阶段,在北周故事画中人物服饰还是以鲜卑褶衣的样式出现。莫高窟壁画北周供养人的圆领袍服与胡服褶衣的区别虽然不是十分明显,但圆领、不开襟、衣身比褶衣稍宽稍长,这些特征还是分明的。至于缺胯袍最突出的特征——衣侧开叉,在北周供养人像中不曾见到。第428窟北壁佛像下面的男供养人、第290窟中心柱北向龕基座男供养人、第290窟南壁下部礼佛的男供养人,均着赭色圆领束腰袍服,不开襟,袍长于胡服褶衣,袖口大于窄袖胡服,但远远小于中原汉人的广袖,衣侧不见开衩。但这并非说明北周时期圆领袍服不开衩。有同时期山西太原北齐娄叟墓中的人物服饰可证:头戴圆形或山字形的鲜卑帽,身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衣侧开衩,腰束蹀躞带,足登长靽吉莫靴。这说明这一时期在北方已经有了衣侧开衩的袍服。而敦煌壁画中供养人所着的袍服没有开衩,可能是因为这一服装样式还不成熟,不普及,画师在创作过程中将其忽略了的缘故。

而在莫高窟隋代壁画中,圆领缺胯袍大量出现,而且袍身加长,衣侧明显有衩口,可见圆领缺胯袍这一服装样式到了隋代已趋成熟。以后经唐代至五代,圆领缺胯袍一直作为常服被男子所爱;在唐代时甚至一度成为公服。莫高窟唐代、五代的壁画中,男子普遍穿着圆领缺胯袍。

(二) 中国女子服饰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尚

褒衣博带是中国传统服饰,自先秦至汉魏,华夏民族不分男女服装一概以宽博为尚。北周时期女子服饰褒褊的风尚继续流行,第428窟女供养人服饰一律为中原传统大袖裙衫。衫大而宽松,衣襟在领处相交,两手拢于袖内,宽大的袖口下垂直至膝部,衫长过膝,近于脚踝,长裙曳地:宽袖、大衫、长裾,层层叠叠,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觉。第296窟东壁南侧女供养人除女童以外,几身世俗女性供养人均着交领大袖襦袄,下着长裙,肩披长帛。

同时,由于反对汉化,除了继续流行褒衣博带汉魏服饰外,莫高窟北周壁画中女子服饰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风尚:上着窄袖小衫,下穿间色长裙,有的在肩上搭一条长长的帔帛,女子体态轻盈,身材苗条修长,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姿态。这是北周时期出现的服饰新样式,它来自西域龟兹装。第296窟东壁南侧女供养人中有一位女童形象,头梳双环髻,上着窄袖小衫,下着间色长裙,裙腰很高至腋下;第301窟东壁南侧两位随主人来佛窟供养的侍女身材苗条修长,手撑伞盖和羽扇,上身着窄袖小衫,下身着曳地长裙,裙腰极高。北周壁画中,这种服饰仅见于侍女、女童身上;而贵族女子仍着宽博衣裳。这种服饰在北周虽然并不普遍,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服饰风尚,对后世,尤其是对隋代和初唐的女子服饰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

窄袖小衫,起于北周,而盛于隋代和唐初。莫高窟北周第297窟女供养人,梳半翻髻,着窄袖衫、长裙、尖头鞋;莫高窟第419窟隋代须达那王子的妃子,窄袖长垂,裙腰高束,第390窟一组伎乐人均着交领窄衫长袖;唐初窄袖小袖比隋代更为新颖,第217窟《普门品》中妇女,着窄袖衫、半臂、长裙、高头履,特别是第329窟的女供养人,头饰椎髻,着圆领露胸窄袖衫,袖长至腕,肩披长帛,束长裙,这是唐代妇女最新的时装——胡服。

北周时期供养人身上出现的帔帛,在隋、唐时期就更是广泛使用了,成为女装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帔帛质地轻柔、飘逸,在裙衫之外十分随意地轻轻地搭在双臂上,长长地垂挂着,并随披着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纷繁的姿态。特别是盛唐以后,女装流行褙褙,帔帛与褙褙广袖相组合,更突出了这一时期女子服装丰润飘逸的特色。《簪花仕女图》中:仕女头戴花冠,身着袭地长裙,裙腰及腋,粉胸半露,外罩一件轻薄透明的宽大长衫,一条轻盈的长帔帛随意地搭在肩头,丰腴洁白的肌肤隐隐可见。那舒缓、飘逸犹如行云流水的动感与仕女婀娜的娇姿相辉映,更显迷人的景象。

(三) 胡服的引入使中国服饰出现多元化倾向

莫高窟北周供养人服饰,相比莫高窟北凉、北魏、西魏供养人服饰,胡服影响更为广泛,中国服饰自北周开始明显出现多元化的倾向。除了前面提及到的由胡服褶衣改进的圆领袍服、窄袖小衫、帔帛等以外,还有鲜卑帽、由鲜卑帽演变而来的幞头、蹀躞带、乌皮靴等,这里特别需要讨论的是男女供养人身上都曾出现的另一种胡服新样——外披对襟大袍。此类服装在北周供养人画像中虽然不多,仅有几例,但却很有特色,着装者都居于壁画供养人行列中的重要位置。

第290窟南壁下层紧跟着比丘的第一身世俗供养人身材特别高大,服饰尤其宽博,内着交领大袖深衣袍服,袍外面披一件红色大袍,头上似扎幅巾。红色大袍圆领,窄袖,对襟,领口处似有系扎,下无扣,领、襟、袖口处以白色缘边或为白色里子,两袖虚垂,颇似后世的斗篷。第296窟东壁门南侧紧跟着比丘尼身后的第一身世俗女性供养像,内着白色襦裙,外披红色长袖大袍,袍服款式同第290窟男供养人所着的大袍,只是领、襟、袖口以黑色缘边或为黑色里子。

上述两种袍服应该为胡装,第290窟佛传故事中有一位西域相师身上所披的也是这种大袍。另外在中亚中世纪早期城堡巴拉雷克城堡遗址中、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都能见到类似的对襟大袍。其中巴拉雷克——捷佩壁画题材为宴饮场面,在保存下来的画面上画着47个人物,其服装款式基本相同,都是窄袖宽身的对襟大袍,领式与莫高窟北周壁画中的袍服不同,主要为右侧带三角翻领。姜伯勤先生认为这些“右侧一侧有三角翻领的敞衣”“实际上是六世纪阼哒人或粟特人中贵族的服装”。

同样的服装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亦能见到,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龟兹国王、大臣和贵族供养人所着的龟兹袍服,窄袖口、开襟,右边半折领或左右三角大翻领,衣襟、领、袖口多饰锦缘或纹样。新疆龟兹是丝路北道的要冲,它既是古代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古老文化发源地之一,是当时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文化艺术交流汇聚之地。龟兹服饰自然也受到粟特等中亚服饰的影响。

这种袍服自中亚经西域传入河西敦煌,在北周以后的洞窟中,尤其是隋代的洞窟中,多处可见此类服式。

莫高窟隋代第303窟北壁前部,二佛并坐图下:东侧第二身供养人戴幞头,身着无翻领白色大裘,红色镶边,黑色衬里内着白色圆领袍服,长及脚踝,露出黑色鞋面。^{①②}见图8左边供养人像。西侧第二身供养人外披白色大裘,大裘右侧为黑色三角翻领,襟袖等处红色镶边,黑色衬里,内着白色襦衫,大袖过膝,系红色曳地长裙,垂下两条白色裙带。

第303窟中心柱东向面:南侧第二身供养人双手托着供盘,榜题为“者僧名子𡵚意”,外披白色大

^{①②}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供养人胡服服饰研究》/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袍,右侧有三角翻领,襟袖等处饰以红色边缘,黑色衬里,内着白色大袖襦衫,下身着黑色长裙。北侧第二身世俗供养人双手托着供盘,头戴幞头,外披白色翻领大袍,左侧为黑色三角翻领,襟袖等处饰以红缘,内衬黑色里子,内着红色圆领袍服,袍服内着白色裤子。见图8中间供养人像。

第304窟西壁龕下北侧第一身男供养人外披白色圆领大袍,领、袖、襟等饰以红色边缘,黑色里衬。见图8右边供养人像。^⑫南侧前二身女供养人着白色翻领大袍,右领为三角翻领,襟袖等处饰红色边缘,内着大袖襦衫,下着曳地长裙。



图8 隋代第303、304窟供养人对襟大袍
(无翻领、一侧三角翻领、圆领)

这类服装均为窄袖袍式,袍身宽博雍容,领式各异,有无翻领(第303窟北壁东侧供养人)、一侧三角翻领(第303窟北壁西侧供养人、中心柱东向面南北侧供养人,第304窟西壁南侧女供养人)、圆领(第304窟西壁北侧男供养人)之别,着装者只是将其披在身上,两袖下垂,如同披风。据姜伯勤先生研究,认为此类服式与阚哒统治时期吐火罗斯坦贵族服装式样有联系,同时还与瓦尔赫萨、片治肯特诸地粟特人服装样式有关联。^⑬总之是同中亚服饰文化交流的结果。

总之,从莫高窟北周壁画供养人服饰中,明显可见服饰多元化趋势。这种趋势出现在敦煌,并非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大都会和枢纽之地,汇聚并融合了中西南北四方文化。而这种文化融合的效应在北周时期只是初露端倪,远未释放出来,到了隋唐时期,这种胡汉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应才得到最为充分的释放。在莫高窟隋唐壁画中,经北齐、北周改革后的圆领袍服,幞头或胡帽、乌靴、蹀躞带,这一服饰体系逐渐成熟,成了男子服装的主流,上自帝王臣僚,下至庶民百姓,都可以穿着这种服装;笼冠、幞头或幅巾,交领大袖襦衫,长裙,蔽膝,高头履:传统的汉式服装仍然在正式或重要的场合使用;源自中亚的外披对襟长袍是贵族男子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女子服饰更是丰富多彩:半露粉胸的大袖襦衫、紧身合体的窄袖小衫、色彩艳丽的及腋长裙、飘逸灵动的波斯长巾、婀娜多姿的各式高髻、千媚百态的面靥妆容,各种服饰混合使用,互为搭配,胡人汉服,汉人胡服,呈现出万千气象。

三、影响莫高窟北周供养人服饰的历史动因

莫高窟北周供养人服饰之所以出现多元化趋势,北周服饰之所以在中国服饰史上具有导开先路的重要地位,这是有其特定时期的历史动因的。

第一,莫高窟北周男女供养人服饰出现大量的褒衣博带式中原汉服,这与北朝时期的两个人物是分不开的:一个是北魏孝文帝元宏,另一个是东阳王元荣。

北朝敦煌壁画艺术风格(包括服饰风格)与中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敦煌壁画艺术风格的变化也是中原文化发展变化的反映。以服饰言,北魏太和年间魏孝文帝元宏为了巩固鲜卑贵族统治,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任用南朝士大夫王肃等制定礼仪,并用刘昶和平齐户蒋少游等按汉晋制度制定五等公服及百官六官衣冠。元宏自己首先“服衮冕以朝飨万国”。太和十八年下令禁穿鲜卑服,改着汉装。尽管鲜卑贵族中有人反对和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很难一时扭转,但在统治者的强力提倡下,鲜卑族的服装起了很大

^⑫图8来源:段文杰主编,中国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7·敦煌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⑬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供养人胡服服饰研究》/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变化,“褰衣博带,大冠高履”的汉晋衣冠,在北方蔚然成风。敦煌壁画中汉装的大量出现,正是这个历史背景的产物。而直接从中原将这种改革后的褰衣博带羽仪服饰带至河西敦煌的是魏明元帝四世孙东阳王元荣。

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治理敦煌时间为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至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25-545)。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请人抄写了大量佛经,并在莫高窟主持营造了第285窟。希望通过奉佛保家护众。东阳王元荣不仅是莫高窟的建设者,而且是将中原文化带到河西敦煌的传播使者。元荣任职敦煌期间,敦煌莫高窟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洞窟形制到壁画内容、艺术风格都有新的发展,南朝“秀骨清像”的画风,以典雅高洁的格调出现在壁画上,而且伴随着“秀骨清像”画风的还有“褰衣博带”中原服饰风格。第285窟“沙弥守戒自杀”因缘故事画中的少女,在北魏第257窟中还是身着龟兹装,而在这里已成了着大袖裙襦的南朝闺秀。故事画中帝王、大臣多为南朝及中原流行的褰衣博带式服装,如五百强盗成佛因缘中的印度萨罗国王,他戴上了中国执法者的首服——獬豸冠(也叫法冠),穿上了深衣袍,手持麈尾,坐在中国式的宫殿里,俨然一位南朝士大夫;几位大臣头戴纱帽,手执笏,着大袖交领束腰曳地长袍。

莫高窟北周壁画中世俗人物身上出现的褰衣博带的汉晋服饰,便是这种风格的延续。

第二,莫高窟北周供养人身上出现圆领袍服,这与北朝晚期北齐北周反对汉化有着极大的关系。

北齐北周反汉化是与大行胡化政策相并行的。譬如重用鲜卑人,统治集团内部结构主要有鲜卑人组成;赐胡姓,既有将汉族中的名门高族赐以胡姓的,也有胡人被赐以胡姓的,如敦煌的令狐整被赐以宇文氏。文化上重胡俗,譬如说胡语、穿胡服、耍胡戏、喜胡乐等。这些胡化政策的推行一方面是鲜卑统治者强烈的民族统治意识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活、文化等领域的一种需求的反映。说胡语,是因为交流的需要,胡乐是宝贵的民族音乐,胡戏也是不同民族社会风俗的一种体现。胡服,相比于汉晋的褰衣博带有其便身利事之长处。魏孝文帝虽然推行汉化服饰,但仍允许保留鲜卑族的裤褶服。到了北齐北周之时,裤褶服逐渐演变,发展成圆领袍服,这套服装既继承了游牧民族裤褶服便于骑射的特征,又吸收了中原服饰宽博雍容的风格,是胡汉融合后的新服式。

莫高窟北周壁画中第428、290等窟中的男供养人服饰明显具有裤褶服发展到圆领缺胯袍的过渡时期的特征。

第三,莫高窟北周供养人服饰出现多元化现象,这是丝路畅通中西交通频繁的直接反映。

北周时期,河西敦煌商业的繁荣、丝路交通空前畅通。具体表现在:第一,贡使往来频繁。从《周书》、《北史》等史书记载可知:自西域来关中的贡使中有中亚厌哒国、西亚波斯国、粟特、高昌、龟兹、于阗等。据西亚有关史籍记载推算,北周也曾遣使到过西亚。张星烺先生指出:“《周书》记波斯王遣使来献方物,而波斯文又记中国献方物于波斯,当时两国确有通好之使可无疑也”,并且推测“波斯与中国的宇文周时互通使节”。^⑭第二,来河西贸易之胡商不绝如缕。史书对此多有记载,所谓“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⑮凉州刺史在州西赤泉袭击吐谷浑时,竟俘获“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绦丝绢以万计”,^⑯当时的瓜州则是“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货”,^⑰北周时的河西诸郡竟然可“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⑱这种盛况在莫高窟北周第296窟“福田经变”中也得到了反映,画中商旅往来不绝,中原商贾乘马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匆匆走上桥头;桥下胡商牵着骆驼等待过桥。丝路贸易内容出现在以宗教题材为内容的莫高窟壁画里,说明丝路贸易已成为敦煌地区社会

^⑭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⑮令狐德棻《周书·异域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

^⑯令狐德棻《周书·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

^⑰令狐德棻《周书·韦瑱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

^⑱魏征《隋书·食货志》,中华书局,2008年版。

生活的基本内容。第三,大量胡人定居于河西。北周时,众多胡人留居河西,并有胡人参政,如凉州刺史史宁、甘州大中正康默、甘州司马安朝、凉州刺史康感等都是西域昭武九姓人士。^⑩以他们为河西各级政权的地方长官,亦可知当时西域胡人定居河西之盛况。

总之,在北周,商业的繁荣、丝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河西敦煌文化的繁荣。西域文化经河西传入中原,中原文化经河西输往西域,而河西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大都会,将四方文化汇聚于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莫高窟北周供养人画像看,北周服饰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河西敦煌为枢纽,东收中原服饰之雍容,西纳西域服饰之灵动,上承汉晋服饰之传统,下启隋唐服饰之繁华,实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

参考文献

- [1]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3·敦煌北周[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 [2]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3]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
- [4]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 [5]段文杰.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 [6]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7]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 [8]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9]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0]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11]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供养人胡服服饰研究/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大连: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 [12]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增订本)(第二版)[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The Costume Study of the Northern Zhou Providers in the Mogao Grottoes

ZHU Xiao-en

Abstract: With parts of the Northern Zhou providers in Grottoes No. 290, 296 and 428 as the study objec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Firstly, the two systems of Chinese men's costumes were originated in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Secondly, Chinese women's costumes took on a new look in that period, which wa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stumes. The fashion pattern of choli with tight cuffs and long skirts had a great effect on women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irdly, the great importation of Hu costume elements led Chinese costume to diversification.

Key words: Mogao Grottoes; frescoes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costume of providers

(责任编辑:陈超拔)

^⑩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